



今年正值辛亥百年，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已经远去，留下的是一幅宏伟的历史画卷，这幅画卷，藏着许多你不知道的细枝末节。本报《新阅读》连载《辛亥年》，告诉你100年前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

祝勇 著  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



摄政王载沣的王府一角，当年汪精卫就是打算在王府不远处行刺载沣



# 一个半夜出恭的人 毁了汪精卫的刺杀行动

才华、热血集于一身的汪精卫，在二十七岁时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——行刺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——摄政王载沣。刺杀的过程一波三折，载沣最终安然无恙。汪精卫却招来牢狱之灾，不过，藉这一“灾”，他却获得载沣等人的赏识，并成为袁世凯的义子。



与汪精卫结为兄弟的袁世凯



清末摄政王载沣，立者为溥仪



年轻时的汪精卫

## 汪精卫在冯自由的眼皮底下溜走了

计划行刺载沣之前，汪精卫的目标曾经锁定在端方身上，后来觉得刺杀摄政王对帝国的打击更大。这一大胆的计划赢得了一位南洋富商小姐的芳心，从此对汪精卫不离不弃，直到抗战胜利后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，都无怨无悔，她就是陈璧君。

在策划起义频频失败的情况下，暗杀，已经成为最受党人青睐的革命方式，一种只需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参加的小型起义，机动灵活，易于得手，因而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在他编辑的《民报》撰文说：“破坏的无政府党之运动有三：曰鼓吹，曰密交，曰暗杀”，“暴君污吏民不堪命，于是炸弹短枪为搏浪之狙击，此第三法也。掌此三法者，或称劫击团，或曰执刑团，盖对于暴君污吏处以逆民之罪，使若辈反省悔过耳。”《民报》所载图画中，暗杀主题占22.67%，而在讨论革命手段的文章中，鼓吹暗杀的，竟占21.65%。

梁启超讽刺革命党领袖，说他们“徒骗人于死，已则安享高楼华屋，不过‘远距离革命家’而已”。梁启超的攻击矛头，是在后方呐喊、远离起义现场的孙中山，而追随孙中山从事后方组织工作的汪精卫，则感到如芒在背，为了证明自己并非贪生怕死之徒，提振趋于消沉的革命士气，决定行刺摄政王载沣。胡汉民闻讯，电令冯自由把汪精卫截留在香港，但汪精卫在冯自由的眼皮下，悄悄溜掉了。

## 半夜，载沣府附近的石桥下出现人影

北京守真照相馆，革命党人设在北京的一个秘密据点。1910年2月2日晚，汪精卫、黄复生、喻培伦等人在这里同饮高歌，“欢声且达户外”。几名剪辮青年，在帝都北京，无疑十分引人注目。

金祥瑞回忆说，那时清室对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已经有所防范，载沣府中警戒森严。他每日出入皇宫，均为马队护从，所以警卫人员亦以马队为多。负责警卫的二人，一是中一区（地址在地安门内银闸胡同）署长年德俊，一是内右五区（地址在德胜门内刘海胡同）署长刘思联，都是旗人。他二人兼任的原因，是载沣每日上朝，必由这两个署的管界通过。

在载沣府以东、鸦儿胡同以西，有一小石桥（无名，往北通甘水桥），这是载沣每天上朝的必由之路。1910年4月2日夜，小桥附近

一个居民起来在门外出恭，他的视线随着他的下蹲而降低，这使他发现了小桥下边的两个隐隐约约的人影，他看不出是男是女，但他可以断定，在这空旷的夜里，他们非奸即盗。回到院里，他大声喊起来，叫声在黑夜里扩散，街坊们都被惊起来，像一群乌鸦，聚合在院子里，又惊慌地出外查看。前面是安静的街口，安静的桥，一个人影也没有。他们以为那个人纯属错觉，就打着呵欠，一个个地回房睡去了，在他们的身后，接连响起木门粗糙的闭合声。

## 一声爆炸后，地面上出现了一间屋子大的深坑

如果桥下那个二尺多高的大铁罐没被人发现，那么，那两个人所做的一切都将被隐藏起来，遗憾的是天亮时分，铁罐被邻居们发现了。于是，有无数双眼睛靠拢过来，仔细地打量这奇怪的物件。没有人知道那个铁罐是做什么用的，上面有套丝盖，旁边有一螺丝，拧着一根电线。人们顺着那根电线往北走，一直走到甘水桥下，发现那根线连着一个类似西门子电话匣子的铁盒子，还连着一个手电门。大家被它吓坏了，于是报告了果子市东头提督衙门的官厅（是本管地面）。层层上达，一直到内务部尚书善耆（肃亲王），九门提督衙门正堂毓朗贝勒及警察内城总厅厅丞章宗祥，诸人均亲自来勘察，可谓阵容庞大，也说明了此事非同小可，因为稍有常识，就会得出这样一个令人惊悚的结论：革命党人在谋杀摄政王。

对这爆炸物，人们束手无策，善耆电传内务部一个名叫何次青的技术职员，小心翼翼地把它拆下来。他拆卸的时候，呼吸声十分细微，却能被围观的每个人所听到，因为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直到他把那只铁盒子拆下来，颤巍巍地端在手心，那口憋了很久的气才喷薄而出。何次青打开铁罐，发现罐内装满黄色及黑色药面，纸筒包装，据说是英国产的，还有橡皮糖的胶质药品。

何次青他们把铁罐里的东西运到德胜门外校场进行试验，配合了约百分之二的药品，随着一声爆炸，地面上出现了一间屋子大的深坑。由此推测，如果安装在桥下的铁罐整个爆炸，即使在远处控制电钮的人，亦难活命。

## 革命党的活动惊动了摄政王府

按照事先的计划，作为炸弹专家，黄复生和喻培伦负责安装调试，他们没有想到，所有的一切，都被一个半夜出恭的人看得

清清楚楚。吴玉章后来在谈到此事时说：“他们首先把炸弹安好，再来安设电线，谁知事前目测不准确，临时才发觉电线短了几尺。怎么办呢？不得已只好收拾重来。”就在这时，那个居民跑出来出恭了，他们只好暂时避开，摄政王府大门也开了，有人提灯出来，他们怕被发现，顾不上取炸弹就跑了，等第二天来取时，炸弹已被人取走。

汪精卫，则是那个控制电钮的引爆者。也就是说，如果炸弹如期爆炸，等待汪精卫的，只有死亡。可见他是存心与摄政王同归于尽的。如在此前他给吴玉章的信中说：

革命之事譬如煮饭。煮饭之要具有二：一曰釜，一曰薪。釜之为德，在一恒字。水不能蚀，火不能熔，水火交煎，皆能忍受。此正如我革命党人，百折不挠，再接再厉。薪之为德，在一烈字。炬火熊熊，光焰万丈，顾体质虽弱，借其余热，可以煮饭。此正如我革命党人，一往无前，舍生取义。

机缘巧合，就这样在漆黑的夜里决定了历史。如果汪精卫此次能果如其言“舍生取义”，不仅晚清的历史需要改写，三十多年后的抗日战争史，也必会重写。

然而，辛亥年的那座小石桥上，什么也没有发生，胡同里的居民在经历了一场虚惊之后，注意力又很快回到他们婆婆妈妈的日常生活中，对于身边发生的历史事件全然不知。帝国军警，就在婆婆妈妈的日常生活里，悄无声息地展开他们的侦察行动。

## 肃亲王说：“案中都是青年人，不要过于为难”

三月初八早晨，抓捕行动开始。金祥瑞在胡同口与返回照相馆的汪精卫不期而遇，这是金祥瑞第一次看见汪精卫清隽的面孔，他在一瞬间疑惑了，因为汪精卫的面孔，与想象中的叛匪截然不同，他甚至有些怀疑自己的判断。但他是帝国的捕快，在这种时候，他不能有所闪失。他上去一脚，把对方踢倒，汪精卫还没回过神来，双臂已被扭在身后。金祥瑞摸索他的全身，搜出现洋五十块，金表一只，帽子落地时，他的辫子也落在地上，原来戴的是假发。金祥瑞抬头时，看见其他的警察扭着黄复生，踉踉跄跄地出现在胡同里。

内务部尚书、肃亲王善耆暗示，在鞠讯汪精卫等时，不准用刑，也不叫下跪。很多年后，当时在内城总厅当主事的王劲闻告诉金祥瑞，肃亲王善耆曾把他叫去说：“案中都是青年人，不要过于为难。”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亲

自审问，汪精卫与黄复生争着说自己是主谋，令善耆颇为动容，连称“义士”。因他们所说的都是广东话，善耆听不懂，于是命人给汪精卫提供纸笔，令其笔录，汪精卫下笔千言，这使他们的交谈在纸页上得以保留。汪精卫一挥而就，文辞之美，立意之正，令肃亲王频频点头。据说，官方准备的供词上为汪精卫准备的罪名并不是谋杀摄政王，而是说他因国人浑噩，想借此警醒国人，显然这是一个有意为汪精卫解脱的罪名。汪精卫在狱中作诗曰：

慷慨歌燕市，从容作楚囚；引刀成一快，不负少年头。

历史固然无法假设，但历史的魅力恰恰在于它暗藏着多种可能性，在于后人对规定情节背后的另外可能的想象——假设年轻的汪精卫没有得到摄政王和肃亲王的“偏爱”，他就“可能”成为像吴越、徐锡麟、喻培伦、彭家珍一样的英雄而被后世铭记。历史将用一座心中的纪念碑来表彰他的牺牲，而不是1946年在南京紫金山以一个工兵营来炸开他钢筋水泥浇筑的坟墓。如果汪精卫果真像他写的那样“引刀成一快”，那么他在历史中的形象就将被彻底改写。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个曾在日本与梁启超展开激烈论战、深信“欲求亿人之命者，必流万人之血”的青年革命家，出狱后竟格外地“热爱生命”起来，回望他的狱中岁月，产生了“莫向燕台回首望，荆榛零落市寒烟”的伤感。

## 汪精卫出狱后被袁世凯收为义子

辛亥年九月十六日，经过一年半牢狱生活的汪精卫，被朝廷开释。汪精卫走出监牢的那一天，路人争睹风采，道路为之阻塞。

汪精卫出狱的第二天下午五时，袁世凯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在内阁总理官署会见了汪精卫，晚上七时，袁世凯设宴款待汪精卫。宴席间，汪精卫和袁克定结为兄弟。他们先向袁世凯叩首，又相对叩首，然后袁世凯南面坐，汪精卫和袁克定向北站立。袁世凯说：“你们两人今后是异性兄弟，克定长，当以仲弟视兆铭（汪精卫字兆铭）；兆铭年幼，应以兄长待克定。我老了，望你们以异性兄弟之亲逾于骨肉。”

汪精卫和袁克定回答道：“谨如大人命。”于是再向袁世凯叩首。仪式过后，这父子三人由杨度作陪，尽情畅饮，至醉而归。⑤

节选自祝勇《辛亥年》（三联书店2011年8月版），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加，有删节。